



風雲兩甲子 弦歌三世紀

交通大學建校120周年暨遷校60周年

1896 肇軍工 1956 於英京 2016
上海 西安



交通大學

西遷亲历者口述史



2

西安交通大学校史与大学文化研究中心
主审 官辉 主编 房立民 整理 房立民 杨澜涛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交通大學

西迁亲历者口述史

2

西安交通大学校史与大学文化研究中心
主审 宫辉 主编 房立民 整理 房立民 杨澜涛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交通大学西迁亲历者口述史.2/房立民主编.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3(2016.6 重印)
ISBN 978-7-5605-8371-6

I.①交… II.①房… III.①西安交通大学-校史
IV.①G649.28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2993 号

书 名 交通大学西迁亲历者口述史 2
主 编 房立民
责任编辑 何 园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710049)
网 址 <http://www.xjtupress.com>
电 话 (029)82668357 82667874(发行中心)
(029)82668315(总编办)
传 真 (029)82668280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2.25 字数 302 千字
版次印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5-8371-6/G·1370
定 价 98.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订购热线:(029)82665248 (029)82665249
投稿热线:(029)82668133
读者信箱:xj_rwjg@126.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西迁人：流芳史册的伟岸群像

贾箭鸣

西迁人，即交通大学西迁亲历者，在西安交大师生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声望，社会上广泛赞誉，校内外引为楷模。值此交通大学西迁 60 周年到来，房立民先生主编、杨澜涛博士协助完成的《交通大学西迁亲历者口述史》前两册问世，这是两本内容丰富感人肺腑的图书，是西迁前辈的礼赞，也是献给西安交大双甲子庆典的一份厚礼。

美哉吾校，史册流芳，成就伟业，关键在人。1955 年启动，1956 年形成高潮，1959 年最终宣告完成的交通大学西迁，出自中央重要决策，源于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融汇着西迁师生员工的万丈精诚和无数心血。如果说交通大学的成功西迁是实现高等教育合理布局和科学发展的一个范例，那么西迁丰碑是由彭康校长率领的全体西迁人用青春、智慧和满腔热血牢牢奠定的。正如这两册口述史所记载的那样，60 年前，“举家西迁高风尚”（江泽民学长语），艰苦奋斗铸魂魄，全体西迁亲历者——那些当年从繁华大上海毅然奔赴古城西安，在大西北黄土高原默默耕耘的教师、职工和学生，以开拓者的勇气，愚公移山的精神，坚忍不拔的毅力，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作出了特殊贡献，为交通大学迁校后取得更快发展，实现质的飞跃建立了不朽功绩。

口述史贵在存真，口述的价值在于还原现场，在于更加真切看到人与事，并从中探寻事物发展的规律。这两册口述史图文并茂，娓娓道来，行文质朴，以大量鲜活的事例、脍炙人口的故事和波澜起伏的心路历程，展开了交通大学西迁的历史画卷，深化了我们对于西迁人、西迁精神和西迁道路的认识。我们从中体会到，“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正是西迁群体的生动写照，是他们用实际行动乃至毕生努力创造出的丰厚精神财富。这笔精神财富弥足珍贵，来之不易，凸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揭示了一流大学的真谛，是实现西安交大使命与愿景的不二法门。今天志在接续薪火勇攀高峰的人们，应该记住西迁前辈的事迹，记住这 16 个字，并赋予其鲜明的时代内涵。

在这里，我不但要向本书的主人公——创造历史的西迁前辈们致以深深敬意，也要诚挚感谢主编房立民先生和他的助手杨澜涛博士。实施口述史在内的西迁史实“抢救工程”，是几年前校党委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由宫辉副书记组织开展，我本人参与了其中的工作。鉴于口述史在我校初次进行，需要有经验的同志担当其事，我特别邀请了校史与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专家组成员房立民先生。他是我的老师，长于写作和编辑，一生笔耕不辍，是大学文化建设的活跃人士，我入学就读期间和留校工作后，都曾跟随他学习采访，由此接触到不少西迁人，从中学到了很多。后来我们之间也多次愉快地进行合作。不过，虽然我这次选对了人，却忘记了对方已是年过八旬的老人家了。但我所看到的是，“老黄牛更赛当年勇”，房立民先生不仅爽快地应承下来，立即就着手进行，还想了很多办法，千方百计把工作开展得更好些。他与新入职的杨澜涛博士一老一少亲密合作，一家接一家登门访谈，一遍又一遍整理录音，一次又一次推敲文稿，字字句句务求其真，废寝忘食在所不惜，短短两年多就紧赶着完成了 41 篇 60 余万字的口述史，其中所耗费的巨大心血可想而知。我想，这两册书的出版本身就是西迁精神发扬光大的一种体现。

口述史是稀缺和珍贵的，涉及交大西迁的内容就更是如此。岁月流逝，时不我与，西迁亲历者现在已是耄耋之年了，许多前辈已经相继离开

了我们,因此史迹的抢救非但势在必行,还很急迫。在本书所采访到的几十位西迁前辈中,我只是跟着去过建校元老王则茂老校长家里,与这位可敬的九秩老人有过一番深谈,于今言语犹在耳际,而老人家却已遽归道山,来不及看到本书的出版了。事实上,已有多位接受过访谈的前辈在成书过程中不幸与世长辞。这警示我们加快步伐,抓紧开展相关工作,把所有应该留下的东西抢救出来,并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资政育人作用。因而,以双甲子校庆为新起点,有关西迁历史的研究与宣传亟待深入,《西迁亲历者口述史》的其他几册也应该尽快问世,形成一个较为可观的图书系列。校史与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同志们愿为此付出更大努力。

(作者系西安交大校史与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档案馆馆长)

目 录

- 殷大钧 跌宕人生,往事流光 / 1
- 沈伯参 回忆交大西迁时的卫生科 / 23
- 翁巧仙 回忆迁校中的一百箱文书档案 / 37
- 章 静 难忘的记忆 / 41
- 张玉璋 交通大学西迁琐忆 / 47
- 屠善洁 交通大学西迁忆事 / 59
- 王守基 我在西迁校园基建工地工作的回忆 / 73
- 方志文 回忆交大西迁时的学校广播台 / 87
- 陈 林 马路上办公的校长 / 97
- 吴百诗 回忆西迁 / 103
- 庄为其 我在交大迁校前后的四十年 / 111
- 屈梁生 鞠躬尽瘁 心血凝成伟业 / 139
- 宋声威 交大西迁往事回忆 / 157
- 赵卓贤 亲历交通大学西迁往事回顾 / 165
- 沈养民 西迁校舍基建回忆 / 187
- 高景孟等 迁校前后的幼儿园 / 197

- 张镇生 蚕丝吐尽织锦绣 心血倾注育英才 / 209
- 赵世星 张鸿副校长对交大西迁的贡献 / 225
- 莫 琿 西迁往事回忆 / 233
- 马知恩 忆交大初迁西安的日子 / 239
- 林文坡 我在交大读书、西迁和工作的回忆 / 255
- 朱继洲 难忘岁月六十年 / 277
- 王世昕 西迁精神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 311
- 卞正中 西迁第一届入学新生 / 319
- 江 涛 老交大的作风·精神 / 333
- 赵保林 交通大学迁校时的工务班 / 337



殷大钧。

殷大钧，字受之，又名殷实，1907年生，浙江嘉兴人，中共党员，九三学社成员。1926—1927年在上海南方大学读书，1928年转入大夏大学，同年考入清华大学。1928年秋参加清华大学党的外围组织“朝曦社”。该社的工作是编辑出版《北方青年》《时代青年》等刊物，宣传马列主义，介绍解放区的情况，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等，在其中担任总务、募捐、印刷、发行等工作。1930年参加地下党组织。1931年夏到1932年夏，由地下党派遭到北平市任文化党团书记，1932年秋经北平市委批准，回清华读书，因功课繁重，无力做党的工作，同年冬，经北平市委批准退出党组织。1933年清华大学毕业。1934年至1935年，在浙江大学任教。1935年至1937年，在河南焦作工学院任讲师。1937年冬至1939年春，在山西抗日民族革命大学第四分校任教务主任、山西抗日决死队第三纵队随营学校及第十一军政干部学

校任政治主任,兼民族革命中学教务主任等多种职务。1939—1941年,在四川三台东北大学任副教授,1941年秋至1945年9月在交通大学重庆本部任副教授,1945年9月,派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院物理系读硕士学位,1948年回国。1948年4月至1956年,在交通大学任教授,同时兼任上海文治中学校长。1956年参加合编我国第一套工科物理教材《物理学》(共三册)。此前该书1955年8月由龙门联合书局初版,1956年12月转由高教社出版,全国发行,为我国工科物理教材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958年由中国物理学会颁发C. P. S 金色奖章一枚。1956年随交通大学全家西迁。1955年秋至1957年秋,兼任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和上海部分物理教研室主任。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1971年摘掉右派帽子,1979年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和待遇。1992年10月,接到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待遇的通知,每月50元,生前未领过一次。1992年10月12日去世。

跌宕人生，往事流光

一、我的人生经历回忆

（一）我第一次入党前后情况

我生长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祖、父两代都是私塾及家庭教师，九岁起，随父亲来到上海在父亲任家庭教师的家里寄居读书，从书本和现实中深知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因此，在上海民立中学毕业后，不报考邮政和海关。因为在当时这两个部门都是帝国主义霸占的。我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旧社会的黑暗十分痛恨。1919年5月4日爆发五四革命运动，我的印象很深，五四前后是中国近代史上大师辈出的年代，各种思想相互相荡，激发新的观点与思想，是令人神往的岁月。是新旧政治，新旧文化交锋的大时代。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那时我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年，但我阅读过不少进步刊物，例如《新青年》和鲁迅的文艺作品等。我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十分向往和羡慕。1928年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由葛春霖同志介绍，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朝曦社”。1930年冬，由张钦益同志介绍入党。张钦益即张立森，当时是清华党组织的书记，解放后曾担任河北省委等多种职务，“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入党后，我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蒋介石政权黑暗统治的活动，积极宣传马列主义，介绍解放区的情况等，那时和我在一起工作的有张甲洲同志，后来他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在作战中牺牲，还有于九公同志后担任黑龙江大学校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另外还有唐锡朝（即唐明照，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等职务）、胡鼎新（即胡乔木）等同志。1931年到1932年夏，北平市委调我到市内担任文化

党团书记，我做过学生运动，领导社联、左联等工作。我在清华读书时，父亲早已去世，家庭经济困难，我靠奖学金和亲戚帮助维持生活。这时，我也想寻找职业，但因大学没毕业，未能如愿。1932年秋经市委批准回清华读书，回校后，因功课繁重，感到无力做党的工作，就在这年冬经市委批准退党。

1933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很难找到职业，那时毕业就等于失业，我就在杭州给私人辅导学业，同时做些翻译工作。接着在1934年到1935年在浙江大学任助教。1935年秋至1939年春，在河南焦作工学院担任讲师。七七事变后，我随焦作工学院师生迁到西安，当时有大批热血青年经过西安奔赴延安，我心里十分激动。这时张立森和他爱人梁明也从杭州来西安，他们对我说，现在已不是安心教书的时候了，应该到前线去参加抗日。当时我的家乡嘉兴已沦陷，我同意他们的意见。接着我们三人就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详细地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并请求帮助我们到抗日前线工作。办事处就介绍我们三人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接着总部就派我们到山西抗日决死队第三中队去工作。这个纵队实际上是在我党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领导和帮助下建立的，但名义上是阎锡山的新军。我们到了以后在杨献珍同志的领导下工作，我从1937年冬到1939年春，先后担任多种职务，主要是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第四分校担任教务主任，山西抗日决死队第三纵队随营学校及第十一军政干部学校担任政治主任，民族革命中学教务主任。当时杨献珍同志在召开党组织会议传达党的指示和布置工作时，都请我参加。他还把图章交给我，委托我代他批阅各种文件，并主持各种工作。有几次他带我到八路军总部，去见朱德总司令，有一次朱总司令和我们两人谈了一个通宵。朱总司令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当时我们表达了请总司令到我们学校来给师生讲话的请求，紧接着朱总司令亲自到我们学校向全校师生演讲，并合影留念。所有这些都使我深受鼓舞，都说明了党对我的信任。1939年夏，我离开山西时，三纵队派人送我到西安。（编者注：如今在山西省左权县武乡有八路军纪念馆、八路军总部纪念馆、八路军文化园等革命基地。）

回忆我在清华工作期间，曾因地下党员唐锡朝和李耕田先后被国民党逮捕，组织上叫我暂时躲避，不要在宿舍居住。毕业离开清华不久，就有宪兵队到我原住房间搜捕。在四川三台东北大学教书两年后被解聘，学校宣布的原因是我“思想左倾”，我在交通大学重庆本部教书时，张立森和梁明也在重庆青木关工作，我时常前往探望，又经葛春霖同志介绍，认识潘菽，他当时是重庆中央大学教授，解放后曾任南京大学校长和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他经常给我阅读党的刊物，我还订了《新华日报》。有一天，校长吴保丰叫我到他家里去，给我看了一个文件，说我是“共产党在重庆教育界的领导人”。

以上这段经历是比较曲折的，有一腔热血豪情，为之去奋斗的阶段，也有过彷徨。但无论是在北平地下党工作，还是在山西抗日前线，我都能按照党的要求去努力工作，受到组织和领导的信任。

（二）我的交通大学情结

在山西抗日前线这段经历，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我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特别是在山西抗日决死队的一段工作尤为难忘。1939年夏，我离开山西时，三纵队派人送我到西安。后经几次辗转到了重庆，又先后在几个学校担任教学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1941年到1945年9月在交通大学重庆本部教书，从此我与交通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辈子都在交通大学从事教育工作。

1. 赴美考察教育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由交通大学重庆本部派我去美国考察教育，我当时的想法是出国能学到一些科技等方面先进知识，对国家建设有利，当时我还同张立森等同志商量，他们都同意我出国深造。我到美国后，首先见到了当时在纽约主办《华侨日报》的老同学唐明照同志，他乡遇故知，特别是老同学，分外亲切，以后我曾多次参加进步人士集会。除了考察教育，我就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研究院物理系读硕士学位。于1948年4月完成学业回国，回到交通大学执教。这时的交大已从重庆迁回上海，也是全国即将解放的前夕，大家都在迎接上海解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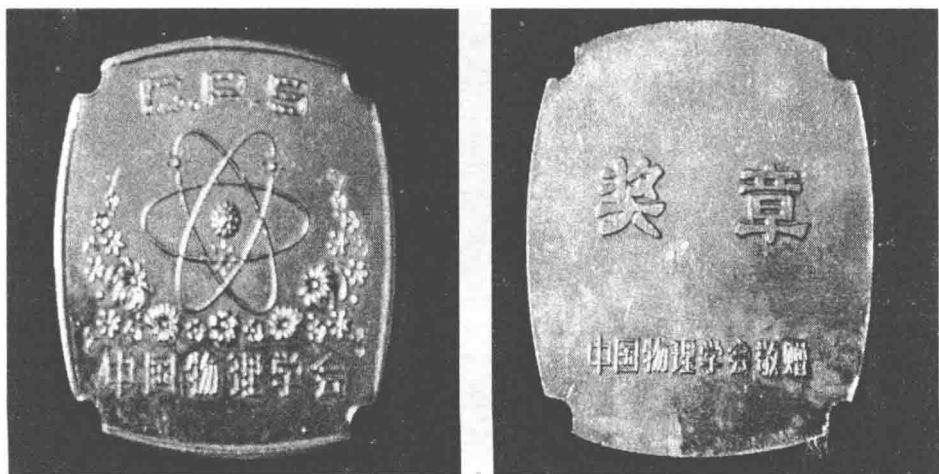
2. 1948 年回国到交大执教

因为我是交大重庆本部派往美国学习的,完成学业后我就回到了祖国,回到了交大。1949 年 6 月 15 日,军管会接管了交通大学。1952 年 8 月,全国范围内院系调整,交大是其中之一。当时交大物理系有吴有训、裘维裕、黄席棠、周铭、周同庆、赵富鑫、许国保、王子昌和我共 9 位教授,有副教授 6 人,加上讲师、助教和 2 位兼任教授,一共 33 人,师资队伍力量很强。1953 年上学期物理为 91 学时,保证了交大“基础厚”的教学传统得以发扬光大和培养具有扎实的物理学理论基础和熟练的实验技能的人才。当时的物理系有普通物理实验室、光学实验室、高频率实验室、电磁学实验室、物理学实验室及热学实验室等。对学生来说,通过这些实验对课堂知识加深了理解和掌握,同时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也为“重实践”打下了基础。培养出的人才基础理论扎实,到社会上工作适应性和创造性都比较强。一直以来,交大毕业的学生很受用人单位的欢迎,就是这个道理。我一直工作在教学第一线。

3. 参加物理学教材编译工作

(1) 参加《物理学》教科书编写

1954 年夏,高教部召开了高等工业院校基础课程和基础技术课程教学大纲审定会议。1955 年 2 月,高教部组成了物理学编写组,编写我国第一套工科物理教材。那时参加编写的有王谟显、江之永和我三人。另外,参加部分编写的有王志符、孙瑞蕃二位。本书分为三册出版。第一册包括力学、分子物理学和热力学两编,19 万字。第二册有电学和磁学一编,21 万余字。第三册包括波动过程、原子物理学和原子核物理学两编,23 万字。这套书除适用高等工科院校外,也适用师范、农林院校。1966 年以前,全国非物理类专业的物理基础课大都采用这套教材。1955 年 8 月,本书原由龙门联合书局初版,1956 年 12 月移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用该局原纸型重印。本书三册,总字数 63 万。多次重印,全国发行数百万册。为此,1958 年荣获中国物理学会颁发的金色奖一枚。



1958年获C.P.S物理学会金色奖章

(2)1959年合编《高级物理学》讲义二册，由交大印刷厂印刷。

(3)1978年组织翻译[美]F. J. Bueche著《物理学导论》一书。分上、中、下三册，78万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译稿初校和修改由秦守正、黄正东、黄嘉豫等担任，最后由我审阅定稿。封面署名为殷大钧等译。

(三)我带头报名全家西迁

1955年春，中央决定交通大学西迁。4月9日，彭康校长在校务委员会上传达了交通大学迁校西安的决定。1955年5月25日，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做出了关于迁校问题的决议。校务委员会决定组织“交通大学迁校委员会”专门研究与处理迁校中的问题，顺利完成迁校任务。彭康校长向全校学生报告了交通大学迁往西安的决定，受到热烈拥护。

我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迁校是完全正确的决定，我曾经动员校内外物理教师来西安工作，我带头报名全家西迁。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时，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开展整风运动，动员师生员工大胆鸣放。回顾当时大鸣大放的情况，仅在开始的半个多月中贴出大小字报几万张，意见、建议数万



1956年西迁时全家合影

条。上海、西安两处鸣放的意见都集中在迁校问题上，一种意见认为交大迁校是正确的，应该迁，另一种意见认为形势变化了，不应该迁，交大西迁是不正确的。双方的争论是激烈的，也是针锋相对的。要求派代表向国务院、高教部汇报的呼声很高，接着北京电话同意派代表去京讨论交大迁校问题。

1957年5月19日，上海代表启程赴京，西安推派了我和朱荣年等3名教工代表，3名学生代表赴京汇报。1957年5月20日以后，国务院、高教部对迁校中双方的争论认真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周总理除参加国务院会议听取全体代表讨论外，还亲自找教工代表和有关负责人谈话。5月28日，周总理下午听取汇报后，又从晚上7时至凌晨2时邀请几位教授座谈，充分广泛地听取意见和建议，6月4日周总理召开了有上海、西安两地交通大学师生代表和其他院校代表参加的会议，研究交通大学迁校西安的问题，我当时都在座，聆听了周总理的讲话。这次讲话对于交通大学的发展，交通大学迁校西安等，都是有决定意义的。在周总理召见时，我只提出按毛主席“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即建议区别对待，让确实有困难的教师留在上海，用定期来西安教课等方式

支援西安，后来教育部刘皑风副部长来西安传达中央精神和周总理的讲话精神，决定将交大分为西安和上海两部分。我当时表示完全拥护，因为这符合我提出的意见。但是到7月初形势突变，反右斗争开始了，反击右派言论。由于反右是在迁校辩论中进行的，把对迁校中的一些看法，同“反党”“反社会主义”混在一起，我因被推选为代表赴京汇报，向周总理陈述了我的意见，回校后我又向全校师生如实传达了赴京汇报的情况以及周总理的讲话精神，在反右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对此，我一直有反抗情绪，结果是被戴上了13年的右派帽子，蒙受冤案。在以后的批斗和思想检查材料中，我始终坚持一句话：“你们认为我是右派分子”，在所写交待材料最后署名都是“你们认为的右派分子殷大钧”。为此也吃尽了苦头。直到1971年摘去帽子，1979年宣布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和原工资级别（我原来的工资级别是教授三级，划为右派后降为五级）。

（四）我第二次重新入党

1986年12月25日，我第二次申请加入了党组织，完成了我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和心愿。我是全心全意跟着党的，党组织对我是爱护的，并引导我上进。在我的一生中，没有做过危害党的事情。党组织对我的爱护和期望，使我感到温暖，受到鼓舞，解除了我多年来的各种顾虑。为了不辜负党组织的爱护和期望，我决心有一天能够重新加入党的组织。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使我认识到只要一息尚存，就应当努力争取重新入党，接受党组织的教育，终身为党的事业去奋斗。我的入党介绍人第一个是赵富鑫先生，他和我在交大同一个单位，相处时间最长，可以说是一辈子都在一起，是相识相知的朋友，工作上同事，“文革”时在“牛棚”是难友。他鼓励我争取入党，我选他做我的入党介绍人，他德高望重，是我信赖的知己。我的第二位入党介绍人是吴寿镗老师，他给我说过，我早年追求革命，曾加入党的组织，为党做了不少有益工作。他也很了解我，他称赞我在五十多年中，始终不渝地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对我的鼓励和鞭策实在是太大了，使我精神为之一振。说起来他比我晚一辈，但